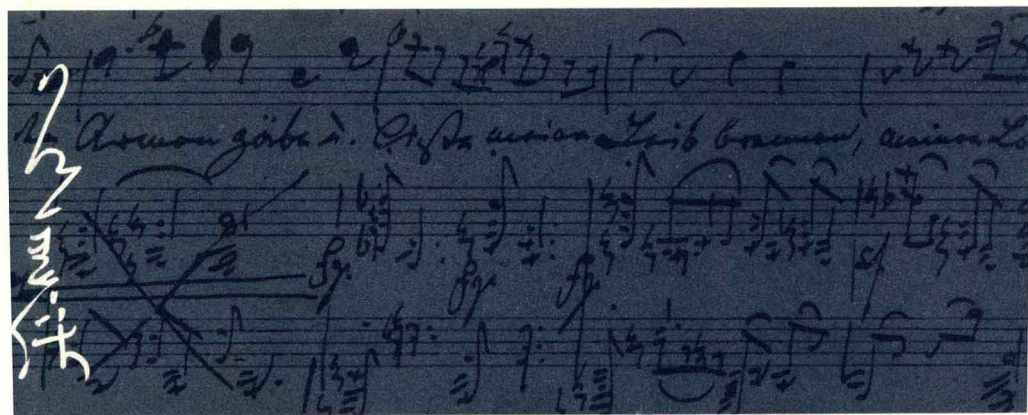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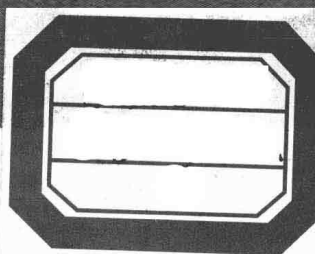


吕金藻音乐文集

2



2



吕金藻音乐文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二零零五年元月



贺绿汀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留影（1981年7月27日），右四为
贺绿汀，右三为吕金藻



吕金藻和吴祖强教授合影（1992 年）

本卷目录

音乐春秋	2
东北沦陷时期的音乐	201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音乐概况	382

音乐春秋

萧友梅

(1884—1940)

博士铜像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一天，一只银燕划破欧洲的蓝天，向东方飞去。当她进入亚洲上空之际，天气骤然发生变化，万里云海，波浪翻滚。驾驶员巧妙地驱使银燕在云海翱翔。只见她在东海之滨上空盘旋几圈之后，徐徐降落在上海机场。一位风度潇洒、留着小黑胡子的中年男子，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下飞机，机场上迎接远方来客的人们急忙上前献上鲜花，并亲切地对客人说：“欢迎您，萧勤先生！”

萧勤是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人萧友梅博士的儿子，是国际上颇有名气的画家，现在侨居意大利。他这次特意从海外归来，是专程参加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萧友梅博士铜像落成典礼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创立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日。这天上午虽然细雨绵绵，但是音乐学院的校园里却人山人海，充满

了节日般欢乐的气氛。你只要稍加留神，就会发现这里荟萃了国内外许多名流和学者：有从美国飞来的李献敏女士，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如今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有来自英国的著名中国钢琴家傅聪，他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儿子；有萧友梅先生的侄女萧淑娴，她是毕业于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如今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还有全国各兄弟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的知名人士和不远万里而来的许多老校友……两千多人，欢聚一堂。

当学生铜管乐队奏起萧友梅博士生前为该校创作的“校歌”时，年近八旬的老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兴致勃勃地为萧博士铜像揭幕剪彩，两个女学生向铜像敬献了花篮。这时，人群立刻沸腾起来，有的鼓掌，有的欢呼，有的拍照……

这尊栩栩如生的萧友梅博士半身铜像，是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教授亲自设计、亲手雕塑的。铜像的神态自如，好象正在那里注视着音乐学院的发展。这尊铜像足有一米高，安置在一个光洁明亮的大理石底座上。底座上镌刻着“本院创办人萧友梅博士 1884—1940 年”字样，字体工整而刚劲有力。在乐曲声中，萧勤和萧淑娴在铜像前面亲手栽了两棵梅树，表示对亲人的纪念。栽完树后，萧勤伫立在父亲的铜像前，久久地凝视着。父亲的生平事迹又一件件地重现在他的眼前……

萧友梅与孙中山

清朝末年，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四处奔走，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封建王朝——“大清帝国”。腐败的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派出大批密探和狗腿子明查暗访，同时还全国悬赏通缉孙中山。尽管反动的清王朝屡施淫威，撒下了天罗地网，可是它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孙中山好象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似的，无影无踪。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清朝政府突然收到一份密报：孙中山已更名改姓逃到了海外，在日本的首都东京。这个消息使清王朝惊慌失措，唯恐孙中山在海外羽毛丰满后，威胁“大清帝国”的安全。于是经过周密策划后，大批密探纷纷跟踪到了日本，并且勾结日本特务在东京展开了对孙中山的大搜捕，妄图一举铲除后患。他们对住在东京的每个华人都投以怀疑的眼光，尤其对那些中国留学生倍加疑心，从严盘查。因为他们听说孙中山曾经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进行过煽动性演讲。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孙中山的下落依然杳无音信。特务们心中十分纳闷：可疑的对象全都查过了，为什么始终未能发现孙中山的踪迹？莫非他已经不在东京？为了便于向上级交差，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敢肯

定的结论：孙中山可能离开了东京。他们的这个结论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他们不分昼夜大肆搜捕期间，孙中山先生却安然无恙地躲在萧友梅的卧室里。

萧友梅为何来到东京？孙中山先生怎么会躲在他的住处呢？说来话长。

原来萧友梅在十七岁那年就东渡日本，在东京私费留学，他除了攻读教育外，还兴味盎然地学上了音乐。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先生为了躲避国内清王朝的追捕，绕道越南来到了日本东京。他到东京后不久，就开始在留学生中间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萧友梅常去聆听他那慷慨激昂、深入人心的演讲，因此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佩。这时廖仲恺先生也在东京留学，而且与孙中山先生交往密切，所以廖先生的住处就成了革命人士秘密活动地点。孙中山先生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一九〇五年在日本组织了一个秘密革命党——中国同盟会，萧友梅就在当年八月二十日第一批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个秘密革命党人。他的介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

当清朝政府的密探在东京刚一出现，孙中山先生就机智地躲到了萧友梅的住处。萧友梅当时住在东京市郊大久保村的乐庐，那里较为僻静。萧友梅不仅亲自照料孙中山先生的起居生活，而且还得充当秘密联络员。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先生，有时在萧友梅的住处开秘密

会，运筹革命策略。为了掩人耳目，廖先生来开会时，总是把自己的小孩也抱了来。开会时，萧友梅就替廖先生照看小孩。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同志。

日本特务和清朝密探在东京大搜捕时，为什么偏偏没搜查萧友梅的住处呢？这是因为他们听说萧友梅是个老实人，而且老实得出奇，平时连一句话都不多说，整天陶醉在音乐的海洋里，不是唱歌就是弹琴。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已，因此对他毫无疑心。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日夜搜捕的清朝要犯——孙中山，恰恰就藏在这个“书呆子”的卧室里。

孙中山先生在萧友梅的卧室里躲藏了一个多月，两人结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密友。

一九〇七年三月，日本政府将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临行前，萧友梅在自己的住处为孙中山先生饯行，廖仲恺先生也在座，三人共进午餐，倾心密谈。饭后，萧友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特意为孙中山先生弹奏名曲一首，以示送行。三人合影留念，依依惜别。

孙中山先生很赏识萧友梅的为人，所以辛亥革命后，当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时，就请萧友梅出任总统府秘书。萧友梅非常敬仰孙中山先生，在他书房的墙壁上常年挂着一张孙中山先生的照片，照片上面有孙中山先生的亲笔题字：“友梅先生惠存”。

萧博士与“马褂”乐队

二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还沉浸在“五四”运动思潮中，校内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团体象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不同思想并存，学术空气活跃。在北大第三院的礼堂里经常进行各种活动：有时开报告会，有时开讲演会，有时演京剧，有时演话剧；自从萧博士来到北京大学后，第三院的礼堂有时还举行音乐会。

一九二三年一天的傍晚，夕阳刚刚落山，绿树成荫的北京大学校园里，人来人往，欢歌笑语不断。大学生们穿着“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的时兴服装（男学生多数穿“西服裤子大布衫”，女学生有穿旗袍的，有穿裙子的），三、五成群地走向第三院的礼堂。礼堂门前有些人正在往里搬运乐器，原来今天晚上又要开音乐会了，怨不得这么热闹。

音乐会尚未开始，礼堂里就已经座无虚席。主办音乐会的人想得很周到，由于灯光不足，台口上还悬挂着几盏煤油灯。台下的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有的在唠家常，有的在看节目单。节目单上印着节目演出的顺序和全体乐队队员的名字，还印着每首乐曲的简介。今晚的音乐会，前半场是独唱和独奏，后半场演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那时叫作《第五套大曲》。

后半场音乐会开始时，乐队队员一登场，台下听众就

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因为他们的穿戴打扮与手中的乐器颇不相称：手中拿的是提琴和洋号，身上穿的是长袍和马褂。上场的乐队队员总共才十五个人。要知道，北京大学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博士、教授为数不少，西去欧美，东渡日本留学的也大有人在。他们都见过大世面，观赏过大歌剧院的表演，聆听过大型交响乐队的演奏。如今面对台上这十五员“大将”，心中未免有些疑虑和失望：“就凭这个小小的马褂乐队就想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

这时，萧博士手持指挥棒稳步登场。他身材修长，削瘦面孔宽额头，戴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黑色西装礼服。当他面带笑容向听众鞠躬时，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萧博士敏捷地轻轻一挥指挥棒，乐队立即活跃起来，强时铿锵如雷鸣，弱时潺潺似流水。乐曲奏得时起时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乐曲刚一结束，台下爆发出雷鸣般掌声，听众纷纷起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萧博士频频鞠躬，以示谢意。

散场后，人们议论纷纷。有位老教授深有感慨地说：“我活了偌大年纪，听过许多著名乐队演奏的贝多芬大曲，可是从未听过由国人指挥、国人演奏的贝多芬大曲，今天还是头一次。在我有生之年有此良机以饱耳福，吾愿足矣！”有的大学生兴奋地说：“没想到这些马褂先生能演奏得这么好！”身边一位久居北京城的老先生微微一笑说：“你们哪里知道，这些人原来都是前清西太后宫内的乐手，全是旗

人。他们从十岁左右起，就被召进宫去接受意大利乐师的严格训练。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再加上萧博士排练有方，所以才有今天晚上的成功。”经老先生这么一说，大家才恍然大悟。

这个马褂乐队就是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是一九二三年四月由萧博士亲手组建的，也可以说它是萧博士心血的结晶。欧洲大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就是由萧博士指挥这个乐队在中国首次演奏的，可惜的是，这个乐队寿命不长，后来被北洋军阀扼杀了。

陈毅高唱《卿云歌》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萧友梅就在一九二〇年春返回祖国。他一进北京城，就被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拉进了“国歌研究会”，并且给他下达了创作“国歌”的任务。萧友梅为了应付差事，根据章太炎的提议，以《尚书大传》中的一段古诗“虞舜卿云歌”为歌词，随意谱写了一曲，题名为《卿云歌》。歌词只有四句：

卿云烂兮，
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前两句的意思是：祥云光辉灿烂，绵延无尽；后两句的意思是：一片光明景象，朝气方兴。

萧友梅心中认为歌词太古老，含义不清，不易流传，因此不适于作“国歌”。他满以为“交卷”也就了事了，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他谱写的这首歌曲偏偏被“国歌研究会”选中了，并且经过北洋政府国务院通过，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开始，《卿云歌》作为正式的“国歌”。

有人可能会想：北洋军阀政府为什么对选定“国歌”这么重视、这么积极呢？这是事出有因的。

据说在清朝时期，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一天，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接到法国大学生的邀请，请他们参加一个由法国大学生主办的各国留学生联欢会。他们原以为是个看看法国歌舞、互相叙叙友情的晚会，所以欣然接受了邀请。可是一进会场，才知道这个联欢会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与会的各国留学生都要登台演唱本国的国歌。这一条规定可把中国留学生难住了，弄得他们六神无主，坐立不安，因为“大清帝国”根本没有国歌。事到如今，也不好打退堂鼓，只好硬着头皮听之任之了。当轮到中国留学生登台演唱时，来自各国的留学生都热烈鼓掌欢迎，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中国国歌哩。中国留学生心想：“绝不能给炎黄子孙丢脸，可是唱什么呢……？”台

下的阵阵掌声催得他们心慌意乱。有一个留学生突然灵机一动，急中生智，低声说：“唱《茉莉花》。”大家会意，于是放开歌喉唱起了江南民歌《茉莉花》。台下各国留学生侧耳倾听，旋律悠扬委婉，东方风味十足，一曲唱毕，掌声如雷。这些人没有想到，东方大国的“国歌”竟如此细腻优美。从那以后，《茉莉花》就被误认为是中国“国歌”在欧洲流传开来。甚至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把《茉莉花》的音调写进了自己的歌剧。

这件事在中国留学生的心灵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许多人归国后纷纷要求政府迅速制定“国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推动下，这种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才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加紧采取措施。

虽然萧友梅对自己写的《卿云歌》并不满意，可是当时还是有些人喜欢唱的。一九二一年，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反对军阀政府与法国反动派勾结，曾经举行过游行示威，有些人在示威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后关进监狱，其中就有陈毅同志。陈毅曾经在狱中高唱《卿云歌》，表示中国人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可见萧友梅的这首歌曲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乐府扎根上海滩

萧友梅在日本留学八年后，又在德国留学八年。海外生涯十六载，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华的音乐要想得到振兴，非有人才不可，要想有人才，必须开办专门音乐学校。”因此他立下了雄心壮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他回归祖国后，本想在北京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在音乐教育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用心血浇灌的音乐教育幼苗——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被北洋军阀政府一道饬令，连根铲除了。七年心血一旦抛，怎能令人不痛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含恨离开了文化古都北京城，匆匆奔赴十里洋场上海滩。

1. 幼芽出土

在去上海的路上，萧友梅浮想联翩。他的知音蔡元培先生最关心美育教育，并积极提倡“以美育代宗教”。这时蔡先生已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相当于教育部长）。萧友梅的理想既然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北京不能实现，于是就把希望寄托于南京政府。

萧友梅到上海后，就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为创办上海音乐院而四处奔走。最初，南京政府的官员们不同意，他

们认为当前急需的是枪炮子弹，而不是吹拉弹唱。后来由于蔡元培出面说了话，他们才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办学，但在经费方面则表示无能为力。这实际上是为了照顾蔡先生的面子而耍了个花招。但萧友梅并不就此罢休，又费了不少口舌，经过多方斡旋，南京政府才同意让他拿出个预算来。

萧友梅非常高兴，心想：自己美好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于是他夜以继日地做了一个十分周密的预算，没想到，南京政府一看预算的数字——三十六万元，吓了一跳，立即驳回。这简直象一瓢凉水浇头，令人心灰意冷。怎么办？难道就此罢休不成？萧友梅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思前想后，别无良策，只有软磨硬泡。这个办法还真灵，南京政府终于同意每月拨款三千元作为办学经费。经费虽然少得可怜，可是萧友梅在前进的道路上却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他走亲访友，总算在法租界陶尔斐斯路——即现在的南昌路，租到了几间房子作为校舍。把象样一点儿的房间腾出来作教室，把堆放破烂的地下室清理出来改作琴房。

可是有一件事把他难住了，院长在什么地方办公呢？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个好地方来，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地在阳台上走来走去。突然，他的眼睛一亮，把阳台仔细打量一下之后。说了声“有了”，就去找人给阳台装上窗子，于是这里就成了阳光充足的院长办公室。他又四处